

· 21世纪经济学系列教材 ·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Economic

History



龚关 / 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Economic History

本书以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为主线，论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的历程及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阐述了新中国近60年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走入新民主主义经济，再由新民主主义经济转向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进而又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变革的过程。

经济史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 南开大学教材资助项目 ·
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系列教材
南开大学重点专业建设系列教材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Economic
History

龚关 / 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

People's Republic

Economic History

经济史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龚关主编.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096-0876-0

I. ①中… II. 龚… III. ①经济史—中国—1949~2007 IV. ①F12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42729 号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11 层

电话: (010)51915602 邮编: 100038

印刷: 北京银祥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组稿编辑: 王光艳

责任编辑: 王光艳

技术编辑: 杨国强

责任校对: 陈颖

720mm×1000mm/16

20 印张 381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9.80 元

书号: ISBN 978-5096-0876-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
负责调换。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 (010)68022974 邮编: 100836

前 言

经济史与经济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首先，经济学理论对经济史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吴承明研究员从经济学的统一性出发对此进行了论述，他认为经济学的统一性表现有三：第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有统一性。例如“资本”，在奴隶社会就有了，但在分析了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完全形态后，马克思才概括出资本的初始形态的发展轨迹。解剖现代社会是解剖古代社会的钥匙。第二，迄今人类各种文明社会都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有前资本主义的遗存和未来的因素。第三，不管在“经济学对象”上有多少理论争论，实际上前资本主义的、西方的和当前社会主义的经济学都主要是在研究那种或这种经济是怎样运行的，它的机制如何，而这也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课题。任何社会经济都是在一定的机制下运行的，否则不能持久。各种社会形态的机制不同，但都有再生产问题，都有增长（负增长）的模式问题和发展周期性问题的，都有主权者干预问题，等等。这其中，有些运行规律是共同的，有些可互相参照。因此，吴承明认为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在经济史研究中，可以把现有的各种理论，特别是对经济运行和其机制的解释作为方法，尤其是思考方法和分析方法，加以运用。^①

其次，经济史研究对经济学的研究也有着重要意义，它可以为经济学理论提供丰富素材及深层次的规律性的成果。正因为此，许多经济学家非常重视经济史，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阿洛伊特·熊彼特将历史、统计和理论视为经济分析必需的三门技术，并强调经济史是“最重要的一门”基本学科，因为，“首先，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历史经验，就不可能指望他能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其次，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学的，它必须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再次，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②

^① 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② 约瑟夫·阿洛伊特·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8-29页。

在经济史学科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是新兴学科,但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其他经济史学科,它对经济学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巨变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去探求中国社会经济变化的内在机理及其成功的原因。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如果取得突破,不仅会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而且对推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也会做出应有的贡献。而要探究这些问题,除了要有相当的理论分析框架外,更重要的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济演进历程的熟悉,即需要深入学习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照搬外国经济学的现象大量存在。中国经济学要发展,除了借鉴外国经济学现有成果外,更重要的是将经济学的研究与中国的实际联系起来,从中取得创新和突破。然而,目前的经济学学习和研究者存在着一个普遍的现象,对历史的无知,不用说对中国古代、近代的历史知之甚少,对新中国的历史也语焉不详,以致极大地局限了他们的学习和研究的视野。因此,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对经济学学习和研究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本书是针对经济学及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而编写的教材,时间跨度是1949~2008年。它以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为主线,力求客观地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近60年的经济演进历程。其中第一章至第八章涉及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的历史,主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新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走入新民主主义经济,再放弃新民主主义经济而选择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体制变革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遭遇的挫折及其经验教训;第九章至第十四章阐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的历史,主要是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通过实行改革开放,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存在的问题及其经验教训。

本书立论有实有据,同时吸收了本学科最新的研究成果,力图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演进的历程客观地展示出来,旨在使学生加强对基本国情的认识,为进一步从事历史学和经济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国民经济的恢复	17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	17
第二节 国民经济的恢复	29
第二章 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完成	37
第一节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37
第二节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的加快和迅速完成	41
第三节 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完成	46
第四节 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完成	50
第三章 “一五”计划的完成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	57
第一节 第一个五年计划	57
第二节 “一五”计划期间的经济增长与波动	61
第三节 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	65
第四节 可贵的探索	74
第四章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	79
第一节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形成	79
第二节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发动	83
第三节 纠正错误、反右倾和继续“大跃进”	89
第四节 “大跃进”的成就及其严重后果	96
第五章 国民经济的调整与恢复	101
第一节 调整国民经济决策的形成	101
第二节 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实施	103
第三节 经济体制的调整	113

第四节	国际、国内局势对经济调整的影响	118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国民经济(上)	125
第一节	“左”倾错误的发展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125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头三年造成的严重经济破坏	129
第三节	“三个突破”与新的经济调整	134
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后三年经济的起伏波动	139
第七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国民经济(下)	145
第一节	“三线”建设	145
第二节	国防尖端工业、地方工业的崛起	150
第三节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154
第四节	经济管理体制的变革	157
第五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国民经济的总体评价	160
第八章	国民经济的前进和徘徊	165
第一节	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	165
第二节	“左”倾错误的持续与经济建设的“新跃进”	175
第三节	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和历史性转折	181
第九章	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改革开放的起步	185
第一节	国民经济的调整	185
第二节	经济调整中改革开放的起步	193
第三节	国民经济调整中的增长与发展	201
第十章	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与经济的高速增长	205
第一节	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经济发展战略	205
第二节	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208
第三节	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	218
第四节	经济发展的成就与问题	223
第十一章	国民经济的治理整顿	227
第一节	国民经济的初步治理整顿	227
第二节	进一步治理整顿	232
第三节	治理整顿中的继续改革开放	238
第四节	治理整顿的成效与局限	242

第十二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	245
第一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确立	245
第二节 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	249
第三节 改革的新部署	258
第十三章 国民经济在波动中发展	265
第一节 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环境	265
第二节 世纪末的战略选择	268
第三节 从实现“软着陆”到扩大内需	277
第四节 经济增长的波动与经济发展	281
第十四章 国民经济高位稳定增长和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287
第一节 经济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新思想	287
第二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294
第三节 国民经济的高位稳定增长	299
第四节 中国经济的未来展望	303
参考文献	309
后 记	313

绪论

一、新中国建立前后的国际、国内形势

1. 旧中国的经济遗产

直到19世纪初，中国的经济实力依然居于世界前列。然而经历康乾盛世后的清王朝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慢，18世纪后期已经显露出颓势，1840年以后又不断遭受外来侵略。自此直到1949年，中国长期遭受内忧外患，社会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与此同时，欧美许多国家相继完成工业化，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远远落后于这些国家。据估计，1820年至1952年期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分别为0.22%和-0.1%，同期欧洲的这两个增长率分别为1.71%和1.05%，而美国更高达3.76%和1.61%。^①经济增长的缓慢，大大削弱了中国的经济实力，19世纪90年代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地位被美国取代，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依然令人失望。从1820年到1952年，“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3降到了1/20，实际人均收入从世界平均水平降到了平均水平的1/4”。^②

中国不仅经济增长缓慢，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经济结构单一。客观地说，近代中国的经济结构自19世纪中叶以后有了很大的变化，近代工矿交通运输业从无到有，并形成一定规模，在国民经济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以手工生产为主的格局并没有改变，近代工业生产所占比例很小，与欧美国家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据估计，1933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仅为249.55亿元，其中属于传统农业手工业的生产总值占87.7%，属于近代工业的生产总值仅占12.3%。就主要工业产量而言，1933年的中国与1913年的俄国相比，煤炭、电力、石油、生铁、钢、机械制造、纱锭只分别相当于俄国的97%、57%、1%、14%、0.5%、4.6%、59%。1935年，中、苏、美、日四国的生产资料生产在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分别为5.5%、58.5%、42.4%、48.3%。近代工业不仅落后，

^① 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

^② 同①，第36页。

而且彼此不相配套，煤用不完，但电力缺乏，生铁只有 1/2 能炼成钢，而轧钢能力仅及炼钢能力的 1/2 弱。^① 1933 年、1935 年是中国经济较好的年份，此后长期的战争使这仅有的生产力又遭受到极大的摧残。

旧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特点是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首先是城乡之间形成的典型“二元经济”，即近代工商、金融业主要集中于城市，城市经济已经开始资本主义化了，但是广大的乡村依然是传统的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不仅没有走上现代化之路，而且日趋衰落，广大农民在原有生产方式下，甚至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其次是沿海与内地经济发展差距很大。中国现代化经济是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刺激下发展起来的，沿海地区交通方便，受通商口岸及外国投资的影响发展较快，而内地由于交通闭塞发展较为缓慢。

在遭受外来侵略以及传统经济关系延续的条件下，旧中国经济关系比较复杂。外国在华资本长期在中国经济中居于垄断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意、日法西斯的资本被没收，英、法等国的资本受到削弱，只有美国的资本在不断膨胀。总体来看，抗日战争胜利后尽管外国资本在中国经济中仍有着重要的地位，但垄断地位已不再。随着国民政府对国民经济垄断的加强，国家资本在国民经济中越来越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私人资本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获得了很大发展，抗战后期至解放战争时期，因遭受国家资本的排挤而衰落。在广大农村，地主土地所有制经济依然占统治地位，个体经济（包括手工业者、小商贩、农民）分布广泛，且数量众多，处于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

旧中国的经济遗产是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落后、结构单一和区域不平衡的经济发展特点，不仅仅是新中国经济发展的起点，而且是制约新中国经济发展、经济现代化的长期因素。新中国成立时，国民政府的国家资本被没收，外国在华资本被征管、接收，构成了新中国国营经济的基础，为新中国政府加强对国民经济的控制提供了前提条件；而数量众多的个体经济的广泛存在，则必然对新中国政府制定如何将中国经济引向现代化的政策产生广泛的影响。

2.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冷战格局

近代以来，中国已经被融入整个世界之中，经济发展已深受世界政治、经济局势变化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形成的两极格局以及两极对峙背景下的冷战局势，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和经济体制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意、日是战败国，不再是国际舞台的主角；法国在战争中沦陷，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英国虽赢得战争却输尽财富，负债累累，威风不再；美国则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军事强国。另外，苏联尽管在“二战”中遭受

^① 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年版，第 46-47 页。

重大损失，但其经济、军事实力空前强大，成为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大国。世界形成美苏两极争霸格局，也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采取冷战政策，实施除战争以外的一切敌对活动和对抗形式，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遏制。

冷战格局中，中国国内以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代表的两大势力的斗争引起了世界两大阵营的关注。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苏联表示将在政治上、经济上支持未来的新中国政府，而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则采取了敌视和施加压力以增加其困难的态度。在这种国际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诞生之初，国家尚未稳固的情况下，只能采取政治上“一边倒”的政策，全力争取苏联的理解和支持，以避免在国际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当然，新中国政府仍是积极地寻求发展同西方的经济关系，因为中国历史上曾与西方国家有重要的经济往来，尽量保持这种历史关系，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的恢复是有重要意义的。只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同西方的关系发展非常有限。“一边倒”的政策，使得中国在争取到苏联的支持同时，也形成了向苏联学习的思想和政策导向，苏联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是一场有国际背景战争，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6月27日，美国派第七舰队插入台湾海峡，作为美国对远东爆发新冲突的部分反应；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开始。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署了《关于朝鲜军事停战协定》，中国历时两年多的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也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对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消除了苏联对中国的疑虑，进一步加强了中苏的友好关系。另外，朝鲜战争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和封锁的政策，紧张的国际关系使得中国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来自外部的威胁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把发展重工业和加强国防力量作为新中国的首要任务。

3. 经济思想（理论）的影响

旧中国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关系是新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史起点，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影响不容忽视，它经过数千年的历史传承早已内化为人们的行为方式。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将其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预示着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将对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产生深远影响。这些思想（理论）通过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决策在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为制度变迁的广泛的社会基础。

(1)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的经济思想形成了自己的一脉相承的传统，如强调求富、重视均富，从整个国家的角度考虑经济问题，经济与伦理相结合，对理想的大同社会的追求等，对历代中国人考察和处理经济问

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①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的确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影响被削弱，但它仍然深深地影响着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下面仅从几个重要方面进行分析。

1) 平均主义思想。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强调求富，深刻认识到求富对国家的强大、社会的稳定的重要意义，管子的“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孟子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正是强调了这一点。同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主流还非常重视均富，把既富且均看做经济生活的合乎理想的状态，认为只有富还不能为社会带来幸福，只有在富的同时又使富的分配较为平均，做到家给人足，才能使国家、社会处于和谐、安定的状态。这种均富的思想不仅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主流，而且，在下层贫苦百姓中也有着强烈的体现，由于中国古代最主要的财富是土地，农民起义时常常提出平均土地的要求，农民起义的口号“均田免粮”、“等贵贱、均贫富”、“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等正体现了这一点。平均主义产生的基础是小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等个体经济。在那种贫富分化极其严重的社会中，农民这种平均主义要求有一定的合理性，这种平均主义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仍广泛存在，强调收入分配的均等、大锅饭、铁饭碗等都是平均主义思想的表现，它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直接相违背，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体制改革、工资改革中，力图打破平均主义的传统，但步履维艰，说明平均主义影响之深远。

2) 重农抑商。重农抑商是中国历朝历代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从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到汉文帝的重农措施，直到清朝初期恢复经济的调整，都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体现。重农抑商政策的根源在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即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于人们来说拥有土地可以获得巨额财富，且地租收入较稳定，是发家致富的最好手段；同时对封建国家而言，农业的发展可使人民安居乐业、人丁兴旺，使国库粮仓充盈，既可内无粮荒、动乱之虞，也可外无侵扰之虑。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发展农业当做“立国之本”，而把商业（有时也包括手工业）当成“末业”来加以抑制。另外，“重义轻利”的传统伦理观念则是重农抑商政策文化方面的原因。重农抑商政策在战国时期对当时农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起到了积极作用。例如商鞅变法，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从而促进了秦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但是，重农抑商政策也导致地主官僚不断兼并土地，使土地高度集中，农民破产流亡，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激化了阶级矛盾，造成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到了明清时期，商业、市场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而统治者依然坚持重农抑商的

^① 赵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42页。

政策，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只能起到阻碍作用。清末至民国年间，重商意识明显增强，但是重农抑商思想经历千百年的潜移默化，已经深入人心。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思想仍不时表现出来。

3) 国家本位思想。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看来，求富必须把富国放在首位。富国意味着全国的生产总量、财富总量的增长，富国对国家政权（君）、对老百姓、对富豪之家都是有利的。而要富国，必须把老百姓求得富足放在优先地位，因为民是生产者，是财富的创造者，君主、政权的财政收入总是取之于民，只有老百姓富了，才有可能从民取得更多，国库才有可能更充裕。至于富豪之家之求富，传统经济思想的主流对此是持消极乃至歧视态度的，因为他们的财富被认为是通过巧取豪夺、“损民贫国”而获得的，因而从事工、商而富的则不被正视。于是，在国家本位之下，富豪之家之求富被抑制乃至被歧视。这样一种思想倾向很容易形成一种仇富的心理，同时也抑制了靠工商业富家的商人对生财之道的探讨。

历朝历代国家政权的行为则反映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国家本位，这个国家是指政权，而不是广义的国家。周代就有了“工商食官”的制度，这实际上是国家政权对工商业控制之始。西汉时期开始实行盐铁专卖，这一由国家政权控制重要资源和重要产业的制度一直被延续下来。这一重要制度实质上就是要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不仅中央政权可以随意对其认为重要的资源进行处置，而且各级官僚更是如此，私人产权从来没有真正被尊重，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由于国家政权对资源的控制，中国历史上没有形成完整的产权制度，它极其不利于市场经济制度的形成。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种原因，这种忽视产权制度的传统被延续下来，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消极影响很大。

(2)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后，必然继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建设未来的国家，因此，新中国成立时就已经确定了未来的社会主义方向，也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对具体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认识，将对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产生重大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基础上，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了科学设想，认为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全部由社会直接占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国家开始消亡，人们将获得自由和全面的发展。这些设想是一种科学预测，是对理想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在质的规定性的理论概括，是对成熟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特征的超前研究。列宁在将社会主义从科学预测变为实践时，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除了强调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要消灭阶级外，更提出社会主义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在存在多种经济成分的情况下，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斯大林发展了列宁的思想，提出社会主义公有

制存在两种形式；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由于他超越了历史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认识存在重大失误，作出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错误论断；建立了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模式（所谓苏联模式），僵化地理解了马恩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过许多有益的探索。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学习、理解存在着局限和偏差，对社会主义建设更没有经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着教条主义的倾向，没有也不可能突破苏联模式的基本框架。

所谓苏联模式，从经济上来看，表现为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它以国家政权为核心，以党中央为领导者，以各级党组织为执行者，以国家工业发展为唯一目的，以行政命令为经济政策，以行政手段为运作方式。限制商品货币关系，否定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用行政命令手段管理经济，把一切经济活动置于指令性计划之下。它片面发展重工业，用剥夺农民和限制居民改善生活的手段，达到高积累、多投资的目的。中国 20 世纪 50~70 年代末，实施的就是苏联模式，它既给新中国带来了骄人的建设成就，也带来了无尽的困惑。

二、新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程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经济史以 1978 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实行计划经济时期。这个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实践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三年，以后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第二阶段，计划经济体制完整实施的 20 年。第二个时期自 1978 年始，实行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初步形成，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1. 1949~1957 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

这一阶段经历了国民经济恢复（1949~1952 年）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 年）两个阶段。在这八年间，最初的三年迅速结束了百年动乱，并采取各种措施奇迹般地在战争的废墟上恢复了国民经济。在此基础上，从 1953 年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苏联的帮助下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也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一个五年计划最终胜利完成成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1949~1952 年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完整实施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和政策的三年，这三年中国的经济制度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征管和接收外国在华资本，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对私营经济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使其符合国家的宏观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目标。在农村，通过实施土地改革彻底铲除了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而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

这三年,实行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同时,由于国家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控制了金融、市场和重工业,为以后迅速向计划经济过渡奠定了基础。1953年,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加快实现工业化的速度,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允许自由市场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显然不能适应这一战略,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被放弃,中国走上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了保障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加快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形成了单一的公有制体制,排斥市场调节,相应建立了政府集中配置资源的机构和制度,计划经济体制形成。

1956年前后,针对刚刚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所暴露的各种弊端,也鉴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曾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工业化模式进行了认真、全面的探索,并取得了初步成果,可惜这种探索因“反右”运动的干扰而中断了。

2. 1958~1978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

1958~1978年的20年依次经历了“大跃进”(1958~1960年)、国民经济的调整(1961~1965年)、“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和国民经济的前进和徘徊(1976~1978年)等几个阶段。总的来说,无论是经济增长与发展还是制度的变革都充满了曲折,其背后的重要原因是不断持续和发展的“左”的错误。

从经济发展来说,这20年取得了很大成就,首先是经济总量和生产能力有了很大增长。从1957年底到1978年底,按可比价格计算,社会总产值增长3.25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63倍,国民收入增长1.96倍,工业总产值增长5.99倍,农业总产值增长0.84倍;^①从1958年到1980年,全国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4339.39亿元,是“一五”时期新增固定资产的8.82倍。从1958年到1978年,基本建设新增生产能力为:炼钢2911.3万吨(为“一五”的10.34倍,下同),煤炭开采36510万吨(5.73倍),发电机组容量4859.5万千瓦(19.68倍),石油开采10973万吨(83.64倍),化肥1132.53万吨(122.57倍),新建铁路交付营运里程18458公里(4.43倍),新建公路153316公里(1.84倍)。^②这些不低的增长速度和可观的新增生产能力是靠高投入和牺牲消费换来的。其次是经过20多年,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国防工业、尖端科学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在改善基础设施、缩小沿海与内地的差距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些都为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20年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第一,经济增

^① 1958年按照1957年不变价格,1978年则按1970年不变价格。

^②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348~351页。转引自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长大起大落。由于急于求成以及受其他“左”的错误的干扰，这20年经济增长起伏很大，最为突出的是“大跃进”及其以后的三年困难时期。195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与1957年相比增长高达21.3%，而其后几年的增长率逐年降低，至1961年增长率甚至为-27.3%，与1958年相比，经济增长的波幅高达48.6%。“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7年、1968年，经济再次出现负增长，增长率分别为-5.7%、-4.1%，1967年与前一个高峰1964年的18.3%和后一个高峰1970年的19.4%相比，波幅也在24%左右。^①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给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了重大损失。第二，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大跃进”时期由于片面强调“以钢为纲”，导致工农业、工业与交通、积累与消费等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国民经济经过1961年至1965年的五年调整极大地改善了国民经济各项比例关系，但随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左”的错误的干扰，国民经济各项比例关系又趋于失调。“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由于“左”的错误没有得到纠正使得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问题更加严重。第三，人口的高速增长。由于“大跃进”和自然灾害的影响，1960年、1961年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分别比上年减少1000万人和348万人。从1957年底到1961年底，4年内全国人口仅增加1206万人，年均增长率仅为4.63‰，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最低阶段。1962年以后，全国出现一次空前的补偿性生育高潮，1963年达到顶峰，全国人口出生率高达43.6‰，比1962年增加1877万人，其后又在较长时间内居高不下，直到1973年政府将人口发展正式列入国家计划，切实抓紧计划生育工作，才使人口增长率下降到1978年的13.53‰。截至1978年底，全国总人口由1957年底的64653万人增加到96259万人，20年间人口增加了近50%。^②第四，人民收入增长缓慢，生活水平没有多大改善。1978年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平均工资仅比1957年增加7元。1978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为175元，仅比1957年增加44%（按可比价格计算），其中农民增加34.5%，非农业居民增加68.6%。^③人均食品消费情况：1957年人均粮食306公斤，棉花2.6公斤，油料6.6公斤，肥猪0.11头，猪牛羊肉6.25公斤，水产品4.9公斤。到1978年，人均粮食仅为318.5公斤，棉花2.25公斤，油料5.45公斤，肥猪0.17头，猪牛羊肉8.95公斤，水产品4.85公斤，多数人均消费增长不大，少数还有所下降。1978年城镇人均居住面积为4.4平方米，农村为8.1平方米。^④在此期间，许多生活消费品都是短缺的，需要凭票购买。

1958~1978年我国在经济制度上实行的是单一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这被认

^①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② 袁永熙：《中国人口》（综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84页。转引自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③ 马洪：《现代中国经济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71页。

^④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

为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表现。然而，它所造成的微观经济缺乏活力和经济运行的低效率，极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正因为意识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从1956年起，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就开始着手探讨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8年和1970年先后对经济体制进行了两次改革，以解决权力过度集中、地方和企业被管得过死的问题。但实际结果适得其反，由于权力下放过快，对已经造成的混乱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之后，中央政府不得不将下放的权力上收，又重新形成权力高度集中的状况，国民经济陷入了“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的怪圈。而且，计划经济所造成的微观经济效率低下，也使企业难以为继。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根本上改革计划经济体制。

3. 1978~2007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成为新中国经济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中国掀起了实行改革开放、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经济快速发展的新的一页。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依次经历了改革开放的起步（1978~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1985~1991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形成（1992~2001年）和完善（2001年至今）等阶段，在经济发展和制度变革上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农村实行和推广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也是改革起步阶段的重点，农村改革成效巨大，成为这一时期农村经济获得巨大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因素。与此同时，开始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一改过去主要是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分权的路径，以“放权让利”为主要思路成为新时期改革的一大特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需要有新的理论突破，也需要对改革进行全面规划。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论，并对改革开放进行全面规划，标志着改革开放进入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推进阶段。包括计划、财政、金融体制在内的宏观管理体制、价格体制、工资体制、企业体制等改革陆续展开。全面的体制改革必然出现新旧体制的摩擦，加上经济工作决策的失误，经济在繁荣中走向过热甚至失控，改革遇到挫折。在治理整顿阶段，改革的步伐放慢。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确立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改革的步伐加快。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成为进一步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改革也从过去注重放权让利而转向规范市场及市场主体的行为。1994年，在培育和发展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同时，重点推进计划、财税、金融、投资等体制的改革，1995年又将注意力重点转向国有企业。在遭遇东南亚金融危机及国内需求不足的双重压力的背景下，1998年，新一届政府明确提出了“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的任务，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金融、政府机构、粮食流通体制、